

近代中国人物

第三辑

《近代史研究》专刊



JIN DAI ZHONG GUO REN WU

《近代史研究》专刊

近代中国人物

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本辑主编 夏良才 曾景忠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责任编辑：刘世龙

封面设计：姜 梁

近代中国人物 第三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5.875插页：4字数：401千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11114·102 定价：2.90元

目 录

文廷式述论	刘 方(1)
左宗棠的建军和治军思想	王天奖(35)
论安庆失守前后陈玉成的军事得失	苏双碧(52)
王韬与中西文化交流	夏良才(77)
康有为《教学通议》析	吴根梁(113)
略论戊戌前后的经元善	虞和平(142)
荣禄与义和团运动	李文海 林敦奎(158)
章太炎与《民报》	王有为(191)
清末台谏中勇于同权奸斗争的“三菱公司”	侯 毅(208)
赵凤昌述论	陈时伟(246)
阮啸仙思想研究	张江明 刘林松(282)
俞秀松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	罗征敬(310)
郭松龄的历史评价	武育文(346)
论陈济棠在广东的经济建设	元邦建(381)
冯玉祥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陈汉孝(411)
李济深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姜 平(452)
王明年谱简编	周国全 郭德宏(471)

文廷式述论

刘 方

文廷式是在晚清政治中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他的政治命运关系到晚清史上几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与戊戌维新变法的成败密切相关。以往，史学界对文廷式研究甚少。本文拟对文廷式一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概貌展开论述。

一、从科场风波到帝党中坚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晚号纯常子^①。江西萍乡人。因其祖父、父亲在广东做官，自幼生长在广东。文廷式的祖父、父亲都是举人出身，官至知州，属统治阶级的中层官僚。但其祖父和父亲都早逝，所以，文氏家境不富。文廷式十八岁(同治十二年)始应顺天乡试，不售，开始自谋生计。他先后为总兵吴长庆、广州将军长善、两广总督张树声做过幕僚。其中，为长善幕僚对文廷式以后的官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长善嗣子志锐与其弟志钧，当时随长善在广州。他们与文廷式结交，彼此相契。志锐二兄弟有两个妹妹，就是后来的珍、瑾二妃，当时，她们也

^① 文廷式字一作道燮、一作道溪，号一作云阁，又号萝德、罗霄山人、菩提流支等。

在广州^①。

光绪八年，文廷式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式第三名。由于他博闻强记，擅诗词骈文，“誉噪京师，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②，成为当时都中清流瞩目、结交的对象。与王懿荣、张謇、曾之撰一起被人称为“四大公车”。后来的帝党骨干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昱等人，都成为文廷式的知友，黄遵宪、江标、皮锡瑞等九十年代维新运动中的知名人士，也与文廷式订交。

文廷式中举以后，几次参加会试都未能登第。光绪十五年，帝党领袖、后清流宗主翁同龢主持内阁中书考试，使文廷式名列第一。次年，在进士考试的复试中，翁同龢，潘祖荫力主把文廷式的卷子列为第一。殿试时，翁同龢又颇费力气地拔文廷式为榜眼。随后，他被授职翰林院编修，具备了跻身后清流、帝党的资格，成为“翁门六子”之一。

翁同龢大力延揽文廷式，自然有其目的。在1884年甲申事变中，慈禧大换军机，黜滴前清流，废止言路，使朝政完全控于自己之手。致使清廷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此后几年，光绪亲政的时刻渐近，但慈禧却不愿放松手中的权力。为帮助光绪从慈禧手里夺过统治权力，以翁同龢、潘祖荫为首的光绪近臣，开始组织

① 许多涉及珍、瑾二妃的史料或回忆录，都说文廷式客长善幕时，曾“授二妃读”。据《文廷式年谱》（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以下简称《年谱》）的作者钱仲联先生考证，文廷式客长善幕当在光绪三年，当时，瑾妃才四岁，珍妃二岁，不可能“受学”于文廷式，较为可信。但钱先生引冒广生言说，“先生（指文廷式）与志锐世交，二妃称先生为三哥，授读非事实也”。考长善同治八年到广东将军任，志锐兄弟和珍、瑾二妃之父长叙（曾为户部右侍郎，长善的胞弟）光绪二年因在康熙皇帝忌日嫁女，被御史邓承修奏参丢官，所以志锐兄弟姊妹都随长善在广州。长善在光绪十年离任回京，（在广州前后二年）二妃相从。文廷式在光绪十年后，因赴京参加会试。常住京师，来往长善家是必然之事，二妃或许常向文廷式问字求教。以此，二妃称文廷式为师，亦未尝不可。魏元旷《光宣金载》（《魏氏丛书》本）云，二妃“将入宫，居志锐家，师文廷式请授文”。

② 《昭萍志略·人物志》。

后清流，主持风议，与当权的西太后及其心腹们隐然相峙。翁同龢极力想培养光绪为独操政权的君主，并物色人才，进入翰林、御史之列，控制言路，利用已有的一点主持科场的权利，为自己“植党”、充实队伍。

此外，文廷式在清廷还特别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厚遇。甲午年，清朝举行了翰詹考试，阅卷大臣未阅卷之前，光绪“出一硃条示阅卷大臣，谓文廷式可置一等”^①。结果，文廷式以翰詹考试第一名升为侍读学士，授日讲起居注官，官品连升三级，可谓“圣眷优渥”。文廷式能够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宠，一方面由于珍、瑾二妃在光绪面前屡称其才^②，而翁同龢也曾在光绪跟前对文廷式“揄扬备至”^③；另方面，光绪也想在自己周围提拔一批亲信。

光绪二十年，日本向清朝挑起了甲午战争，慈禧和掌握军权的李鸿章主张对日妥协。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们围绕光绪组成帝党，公开反对后党、淮系。在斗争中，文廷式成为帝党的中坚力量，他上奏光绪，要求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好战争的准备，“谋所以扼要制人之术，无使失算于前，复受侮于后”^④。

战争还未开始，文廷式就感到，李鸿章决不能领导一场使中国取得胜利的对外战争。他在上折中指出，“李鸿章立功之始藉资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可恃……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权归于赫德，北洋之兵权制于德璀琳，故一有变端旁徨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⑤。战争开始后，他建议派知兵大臣到前线去督战，因

① 《掌固零拾》卷三。文廷式致于晦若函谈这次考试，也说“未阅卷前，陈笔特写文廷式一等五字交下。”（《芸阁先生书牍》，见《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奏议·书牍·杂著》，以下简称《全集·书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

②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崇文书局1918年版）94页。

③ 《掌固零拾》卷三。

④ 文廷式《奏为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见《全集·奏议》。

⑤ 文廷式《朝鲜事机危迫条陈应办事宜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丛刊本《中日战争》）二，608页。

为李鸿章不可信赖：“李鸿章一味求和而朝廷责之以战，实非本意……夫上、下不一心而强与敌人从事，未有能济者也。”^①说明他对李鸿章的投降本性看得很清楚。当时，帝党主张倒李鸿章、起用恭亲王奕訢，文廷式领导翰林院翰林联衔上奏，要求让奕訢重新参政并参劾了李鸿章。《马关条约》签定后，文廷式上书争言和约不可从，要求皇帝下诏“言尺土一民，皆当与倭为仇，永不复言和议”，建议迁都、废约、再战^②。

在这场伴随帝、后党争的和战之争中，翁同龢在清廷的中枢机构军机处主战，文廷式和张謇是翁氏主战的谋士^③，而实际上，文廷式是帝党出面组织斗争的领导者。文廷式自己有一段话，直接道明了这一点：“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④文廷式是一个敢于直言的爱国者。战争过程中，后党推行的投降政策，常使他义愤填膺，抑制不住地放言攻击后党。他曾参劾孙毓汶（在军机处代表慈禧意旨主和者），以致慈禧说他“语涉狂诞”，并恶狠狠地说：“事定，当将此辈整顿。”^⑤整个后党对文廷式都非常痛恨。

文廷式和帝党的一系列活动，没能阻止后党的投降步伐。但是，伴随着这场战争而进行的帝、后党争，并不是没有是非可言

① 文廷式：《奏为战事已开，请严飭在事大臣力祛壅弊折》，见《全集·奏议》。

② 文廷式：《和议难成请速断大计以抒天下之愤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卷三十七。

③ 《文廷式年谱》的作者钱仲联先生说：“先生（文廷式）与季直（张謇）皆翁尚书门下士，尚书主战之论，二人阴实主之。”钱先生并言“翁尚书为余之舅祖，此事余闻之庭训。”考翁同龢日记，甲午、乙未年，张謇、文廷式频繁拜谒翁，并与之密谈。例如：甲午年七月十八日：“……归后，文芸阁、张季直先后来谈，时事可怕也，骇耸人骨，抵晚始去。”

④ 文廷式：《闻尘偶记》，见《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一期。

⑤ 《翁文恭公日记》册三十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的。帝党的斗争，多少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反抗外国侵略的要求，表现了帝党爱国主义的思想特点。文廷式为了反对后党投降卖国而不怕罢官落职的行为，值得肯定。

甲午战争失败了，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这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以很大的刺激。一直希冀整饬朝政的帝党，在甲午战后出现的维新热潮中，普遍倾向维新。

文廷式和帝党们频繁地筹议改革政治之法。据戊戌老人张元济回忆，甲午战败使“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据张元济说，参加者有文廷式、陈炽、沈曾植、沈曾桐、徐世昌、汪大燮等人^①，多数是帝党骨干。文廷式是这些集会的组织者。但是，由于帝党们的思想水平不一，他们虽倾向维新，但对如何改革却没有具体、一致的办法。清流们一贯好夸夸其谈，议论常常不着边际。松筠庵，是帝党们常聚会的另一个地方。费行简曾参加过这里的集会。他说，文廷式“日集京朝官松筠庵，论朝政得失。予亦尝赴其约，然所论多迁谪官吏事，罕及大计。予笑曰：此袭东林而加厉者，后谢不往。”^②把这种集会比做东林党的集会，一方面，说明了集会的政治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帝党对改革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文廷式对改革虽有所考虑，却也还没有成熟的想法。

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方案，使帝党看到了救亡的出路。

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帝党开明的政治主张一直较感兴趣。甲午战争中帝党主战，赢得了维新派的支持。光绪二十一

①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见丛刊本《戊戌变法》四，323页。

② 《慈禧传信录》94～95页。

年四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唱和了帝党的主张。公车上书比帝党拒和的主张更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改造中国、用带有资本主义化的措施改造封建制度的维新变法方案，给了帝党极大的影响。

无权无势的维新派，从帝党们倾向维新的行动中，看到了实行维新变法的捷径。他们积极谋求与帝党联合，共同对付顽固守旧的后党。帝党同时也在寻找与维新派联合的机会，除了改革封建政治的真诚愿望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这种联合，加强他们的实力。甲午战争中，帝党在党争中受到了打击。光绪二十年十月，慈禧革珍、瑾二妃妃号，谪其兄——帝党骨干志锐往乌里雅苏台。十二月，极力主战的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更令帝党担忧的是，当时京中竟有西太后要废除光绪的传闻^①。战后，后党把卖国条约的签定归罪于帝党“主战误国”，并酝酿弹劾文廷式，文廷式只好告假南归。帝党要利用战后全国人民对后党投降派的痛恨，重新部署。他们需要维新派的勇气和具体办法。

还在光绪二十年七月，给事中余晋珊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要求焚《新学伪经考》，禁止康招收弟子。文廷式与帝党们一起致电广东提学史徐琪营救^②，表现了帝党对维新思想的倾向。战后，维新派和帝党两派人物频繁往来，商讨改革大计。文廷式积极与康、梁结交。梁启超曾评价文廷式：“能言传教”，“此人自是可人也”^③。翁同龢屡向光绪保荐康有为。

① 《张謇日记》（一九六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四月八日：“又闻慈宁为穀庙（同治）立瑞王之孙溥伦为子。瞻望北辰，忧心如捣。”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中“光绪帝之几废”一段（见丛刊本《戊戌变法》四，271～272页）记载文廷式甲午战后劝刘坤一阻止废立之事。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丛刊本《戊戌变法》四，128页。

③ 梁启超：《与穗卿足下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48页。

帝党与维新派正式、公开的合作形式，是开办强学会。

维新派把开办学会，看作是维新运动的关键问题，认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材；欲广人材，在兴学会”^①，开学会以达到“开风气”、“开知识”、“合大群”的目的。

文廷式是赞成开学会的。他认为，外敌当前，内治不修，只有开学会，团结同志，才能万众一心，共同对敌。他把当时“人材不振”，归咎于“国初，禁立社，禁学会”^②。战争期间，文廷式在松筠庵等地方“广集同志”，商讨对策，和战后帝党的集议，实际上具备了会的雏形。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底，文廷式假满回京。此时，为创办强学会作准备，康有为和帝党成员陈炽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报开二月，舆论渐明。”^③康有为认为条件成熟了，准备开强学会，但遭后党大嫉。沈曾植、文廷式等人劝康有为离京。八月底，康有为前往上海去开办强学分会，留下梁启超办会务。十月初^④，强学会正式成立。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为学会的骨干分子，梁启超、汪大燮办会报《中外纪闻》，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都对学会予以大力支持。强学会“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⑤，它的政治目标是“谋政治之改革”。学会广储各类新书、地图、科学仪器，邀人参观，传播资本主义文化。梁启超说强学会“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⑥。它实际是帝党与维新派联合的政

① 梁启超：《论学会》，见丛刊本《戊戌变法》四，375页。

② 文廷式：《闻尘偶记》。

③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丛刊本《戊戌变法》四，133页。

④ 据汤志钧先生考订，强学会成立时间应在同年十月初，本文采用此说。参见汤志钧《汪穉卿师友手札中关于强学会的史料》，见《文物》1978年第七期，以下简称汤志钧文。

⑤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126页。

⑥ 梁启超：《梁任公书牍》，见丛刊本《戊戌变法》四，225页。

治团体。

但是，强学会因为想求得各派人物的支持，拉进了许多杂品人物，造成矛盾重重。主要制造矛盾者为张孝谦和丁立钧。张、丁二人始而互相争斗，继而合作向帝党、维新派进攻。强学会筹组之时，原拟定以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①。张、丁一加入，就以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②。二个月后，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谕旨令都察院查明禁。张、丁等人为自保又欲散伙。在李鸿藻、翁同龢、沈曾植、文廷式等人的奔走下，强学会恢复为官书局，由孙家鼐主管。但此时，丁立钧又处处刁难文廷式，因为孙欲请文廷式总理书局。后来，书局分四门，文廷式分管选书，但他不久就被弹劾离京，书局遂一蹶不振。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杨崇伊弹劾文廷式，十七日，慈禧下令，光绪颁谕，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文廷式的被弹劾，可以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大量史料证明，杨崇伊弹劾文廷式，是由李鸿章一手操纵的。

甲午战争期间，文廷式曾上折历数李鸿章的五大罪状，请光绪“发谴”李鸿章，以“老成宿望者”代之^③，这对李鸿章来说，是不能轻易忘记的事情。战后，文廷式告假南归，途经上海，随身所带枕箱中，藏有“指陈时事”、“其语颇有侵合肥者”的奏稿草稿七篇被窃，落入李鸿章亲信之手，转交于李，李于是“密白太后”^④。

① 汪大燮：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汪康年、诒年书》，见《汪穉卿师友手札》，转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以下简称《传稿》），上编《文廷式传》，注十一，34页。

②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汪大燮《致汪康年、诒年书》，转引自上引汤志钧文。

③ 文廷式，《参昏庸骄蹇丧心误国之大臣请旨罢斥折》，见阿英《近代外祸史》142—146页（潮锋出版社1950）。

④ 顾家相《五徐读书庵随笔》卷下（民国八年聚珍版），《萍乡鼎甲》，胡思敬《文廷式传》，见闵尔昌《碑传集补》（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本）卷九。

另外，据汪大燮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致汪康年、诒年书》云：“又，正月十三日，停毓庆宫。十四，杨崇伊为合肥访查台馆弹劾东事之人，开一清单，凡三十余人。十五、六，合肥又独诣长信（按指慈禧）呈之。十八，杨即以弹芸阁章就正合肥。合肥将行有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至津，又告人云：劾我诸人，皆不安矣。……”^①而同年四月八日的《张謇日记》，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闻二月李鸿章临使俄时，请见慈宁，折列五十七人，请禁勿用，第一即文道希（廷式）。李出京，而御史杨崇伊抨弹道希之疏入矣。杨、李戚也。”由此可以证明，李鸿章对文廷式甲午年弹劾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在他出使俄国之前，就指使他的儿女亲家杨崇伊弹劾文廷式。而且，李鸿章在赴俄途中，还在遥控北京弹劾文廷式的事情。李系的沈能虎、盛宣怀随时给李发电报，报告具体情况^②。

至于慈禧对文廷式的痛恨，可以说是与日俱增。敢于违抗慈禧意志的珍妃，曾经是文廷式的学生，这种传闻本身就令她增加了对文廷式的几分恶感。甲午战争中文廷式的言行，已使她无法忍受。战后，文廷式不得不以“回籍修墓”为借口告假南归，就是为了躲避后党咄咄逼人的攻势。文廷式回京后，积极倡导帝党与维新派联合，屡向光绪进言，应“变易旧法”、“劝帝变法维新图强”^③，加剧了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对立，这使她对文廷式等帝党人物恨之入骨。杨崇伊在奏折中，指控文廷式“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而所谓文姓太监，却是一年前就已发往黑龙江就地正法的太监闻德兴^④杨故意改“闻”为“文”，牵连扳引，就是要让慈禧联系文廷式

① 转引自汤志钧《传稿》《文廷式传》注九，301页。

② 参看汤志钧《传稿》上编注九301—302页。

③ 朱沛蓬：《清代鼎甲录。文廷式事略》见《全集·传记》。

④ 《翁文恭公日记》册三十五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与二妃的关系。慈禧在杨折递上的第二天，迫不及待地地下令将文廷式革职，并指斥文廷式“遇事生风”，平日“话多狂妄，不知谨慎”^①。可见，除所谓“交通官禁”之罪外，慈禧更恨文廷式甲午主战和战后参加维新活动。

文廷式的革职，是后党向帝党、向维新运动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文廷式是光绪近臣、帝党骨干，又是强学会的组织者之一，是代表帝党参加维新运动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是帝党与维新派合作的中间人物。亲身经历了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的叶昌炽，说杨崇伊是戊戌政局全翻的“发难”者，而文廷式是后党杀向维新运动刀刃的“首樱”者，由文廷式的革职，感到“钩党之祸，近在眉睫”^②。梁启超说文廷式革职的诏谕，“如春天起一霹雳，京师人人震恐”^③。更有人把文廷式的革职看成“戊戌政变之先声”^④。说明文廷式的革职，预示着后党将向维新运动全面反扑，是戊戌政变的序曲。

文廷式的革职，对他个人不能说不是悲剧。为了能踏上仕途，谋取一官半职，他奋斗了十几年。入仕以来，深得皇帝信任。从文廷式早期的思想来看，他是有一番政治抱负的。从他在甲午战争中和战后的活动来看，他也是一个敢于有所作为的人物。因为处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最里层，过早地夭折了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政治生命。但是，罢官以后文廷式并没有回乡养老，而是继续参加政治活动，并对维新运动表现了更大的热情。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其它帝党的特色之一。

①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上海蟪隐庐石印本，民国二十八年）戊戌八月初十日、丙申二月十七日。

③ 《戊戌政变记》60页。

④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10月影印本）81页。

二、罢官以后的活动、去向

文廷式被迫南归到上海后，以上海为据点，密切注意北京的政治动向，并与维新派、帝党继续往来，策划维新。

文廷式到上海不久，就与梁启超、汪康年、麦梦华有过叙谈。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文廷式《致梁、汪、麦书》说：“沪上淹留至五十日，为平生三十一次到沪最久之一次。非为公等别无所谓也。欢叙之乐，如何可忘？即此言说群说会为天地古今第一至言妙道矣。”^①说明他与维新派关系密切，志趣相投。文廷式还与在上海的一些维新人士如汪康年、江标等人探讨中国的维新运动是否应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程式，是尊王讨幕，还是尊王佐幕^②。

文廷式与整个帝党和维新派一样，看不清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积极谋求日本支持维新运动。光绪二十四年初，文廷式和郑观应、郑孝胥一起，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商讨中日合作，建立亚细亚协会。

闰三月初七日，亚细亚协会成立大会假郑观应寓所举行，由文廷式、郑观应、郑孝胥、何嗣焜为主席。与会的日人有小田切，三井、三菱两个洋行的总办，华人中有帝党张謇，维新人士江标、汪康年等等^③。亚细亚协会的宗旨，是所谓“联结同洲、开通民智、研究学术”，拟开展几方面的活动：（1）研究立宪章程；（2）兴办学

① 原件为上海图书馆馆藏，转引自汤志钧《传稿》上编，308页，《文廷式传》注二十六。

② 见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日本原书房1981年6月第2版）下，875—879页。

③ 参见《兴亚大会集议记》，见《湘报》（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六十九号。

校、藏书楼、博物馆；(3)发刊亚洲日报^①。

上海亚细亚协会后来又举行了选举议员的活动，举小田切为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文廷式没有参加这些活动。四月，他匆匆南下，到了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湖南。文廷式在湘省呆了近一个月，曾与湖南巡抚陈宝箴有过谋划，积极向陈举荐维新人材。此时，北京的维新运动已进入高潮，传闻“文廷式有起用之信”^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折，弹劾文廷式“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专以诽谤朝廷为事”，请求“密拿大同会中人”^③，并请慈禧训政。初六日，上谕恳求慈禧重新训政，戊戌政变正式发动。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八月初十日，谕旨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江西巡抚翁曾桂“访拿”文廷式，“押解来京”^④。

诏捕文廷式的谕旨传开时，文廷式已经销声匿迹了。他的去处，几乎不为人所知，风传他已经逃往日本去了。就连他的好友、秘

① 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宣统三年香山郑氏刊本)，卷二，《学务》“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

②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戊戌五月初三日、五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九日，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二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461页。

· 杨崇伊说文廷式“创办大同学会”云云，纯粹是捏造事实、扩大事端的不实之词。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丁酉(1897年)冬，日本横浜侨商发起组织学校，想请祖国的新学之士为教师，孙中山推荐梁启超，并代定校名为“中西学校”。康、梁推荐了徐勤，康有为又更改校名，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相赠。考戊戌八月十二日，御史黄桂鋆所上折说：“有徐勤等赴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则所谓大同会，当指大同学校，较杨崇伊所说，稍为接近史实。而文廷式与大同学校，却是毫无关系。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见《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页48；《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7页。

④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密救助他脱险的陈三立，也持这种看法^①。在刘坤一回答清政府密旨的奏折中，说文廷式正在海外游历，宜俟其归国之后，再进行处置^②。解放以来所出版的近代史著作、文章、辞书，凡涉及文廷式者一律采用了此说^③。四十年代初，钱仲联先生在其《文芸阁先生年谱》（初稿）中，根据文廷式手书《齐天乐》词中小序，证明文廷式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二月尚在上海，推断他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发生时没去日本，而将文氏东游之事系于光绪二十五年条下，认为应在此年三月之后。

197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首次刊布了文廷式的《东游日记》。此日记记载了文廷式在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到三月的游日旅程，似乎可以说明文廷式的东游时间是在庚子年。近有同志根据《东游日记》，已提出了此种观点，但因没有确切的史料为旁证，没能断言文廷式在戊戌政变发生时没去日本^④。

通过对史料的检索钩稽，我们找到了确凿可靠的原始资料，证明文廷式戊戌政变发生后并没有去日本，而是在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帮助下脱险，匿迹上海，躲过了清朝政府的追捕。从而，我们可以摒弃长期因袭的传

① 陈三立“文学士诗序”，见《散原精舍文集》（民国三十八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册下，卷十五。

② 《日本外交文书》卷三十一，册一（日本外务省编，1954—1955，东京）第609号，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都筑电文“关于救助前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文件”中所引刘坤一奏折。517页。

③ 例如汤志钧先生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和1982年修订本，都持相同看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变作，廷式虑祸及，乃走日本。”《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修订稿）“文廷式”条云“戊戌政变发生，东走日本”。

④ 参见汪叔子《文廷式庚子日本之行》，载《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一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